

钱颖一 主编

比较译丛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2006年《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最佳图书

《哈利·波特》畅销世界，成为一度低迷不振的全球出版业的救世主；
而两万多亿美元的援助却无法实现西方救穷国于水火的救赎之愿。

原因何在？

白人的负担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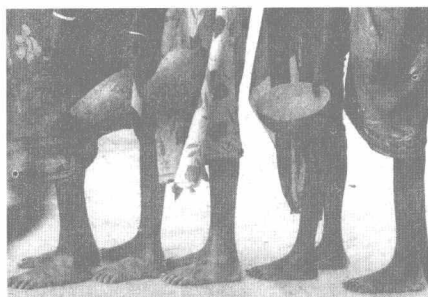
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白人的负担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崔新钰◎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人的负担 / (美) 伊斯特利著; 崔新钰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9

书名原文: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ISBN 978-7-5086-1296-6

I. 白… II. ①伊… ②崔… III. 贫困-经济援助-研究-世界 IV. 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025 号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by William Easterly

Copyright © 2006 by William Easterl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白人的负担

BAIREN DE FUDAN

著 者: [美] 威廉·伊斯特利

译 者: 崔新钰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1120

书 号: ISBN 978-7-5086-1296-6/F·143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章 计划者与调查者的较量 / 2

第一篇 计划者为何无法带来繁荣 / 29

第二章 “大推进”传奇 / 30

第三章 无法进行计划的市场 / 48

第四章 计划者和暴徒 / 89

第二篇 承担责任 / 129

第五章 富人有市场，穷人找官僚 / 130

第六章 救救穷人们 / 166

第七章 医治者：成功与悲剧 / 189



第三篇 白人的军队 / 213

第八章 从殖民主义到后现代帝国主义 / 214

第九章 对贫民的侵略 / 248

第四篇 展望未来 / 273

第十章 本土的发展 / 274

第十一章 西方援助的未来 / 296

注释 / 311

插 曲

阿玛丽奇

我开着车，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驶往乡村。然而在路的另一侧，数不尽的妇女和女童正在朝着城里的方向行进。她们小到9岁，大到59岁。每个人都挑着柴火，被压弯了腰。沉重的担子驱使着她们都小跑着前进。我觉得她们就像是被隐形人驱赶着的奴隶。她们从距离亚的斯亚贝巴几英里远的大片桉树林里捡拾柴火，前往城里。妇女们将这些柴火带到城里的市场上，在那里出售换钱。卖柴火的钱就是她们一天的收入，为了获得这些钱，她们要用一天的时间步行往返于城市和农村。

后来我在BBC新闻故事中听到了一个有关拾柴火者的故事。阿玛丽奇，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每天早上3点起床去捡桉树的枝和叶，然后步行到城里去卖。阿玛丽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个美丽的人”，这个小女孩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说：“我不想一辈子都捡柴火。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很穷。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要去捡柴火，这样才能帮助父母养活我们。我更想去上学，再也不想为钱的事发愁了。”¹

另一组西方电视媒体第一次到埃塞俄比亚了解贫困状况的时候，他们回到旅馆后就泣不成声²。这才是应有的反应。还有什么能比这些孩子的未来更重要呢？我将此书献给阿玛丽奇以及千万个像她一样的孩子们。

第一章

计划者与调查者的较量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用耐心去遵守，
用面纱去遮掩恐怖的威胁。
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进行自豪的展示；
千百次地以朴实无华，
去找寻他人的果实，
去追求他人的收获。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那野蛮的和平之战——
扬起风帆，向饥荒宣战，
发出召唤，终结病痛。

——罗德亚德·吉卜林
《白人的负担》，1899 年

对于穷人们的两大悲剧之一，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知之甚多，且能言善辩。2005 年 1 月，在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中，他谈到全球有数十亿人正忍受着极度的贫困，数百万儿童死于可轻易预防的疾病。布朗呼吁，将国际援助额提高一倍，为全世界的穷人们制订一个“马歇尔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西欧经济的计划）；再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将筹措而来的数百亿美元，用于救助忍受贫穷折磨的人们。布朗希望人们看到希望，因为完成以上种种善举并非难事。将疟疾死亡率降低一半的药剂，每剂仅需 12 美分。预

防儿童感染疟疾的蚊帐，每顶只需4美元。未来十年内，在每位新生儿母亲身上投入3美元，就能减少500万婴幼儿死亡病例。给每个家庭投入很少的费用，像阿玛丽奇这样的孩子，便能入学接受基本教育。³

对于穷人们的另一大悲剧，戈登·布朗则避而不谈。这个悲剧就是，在过去50年中，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以减少全球一半的疟疾死亡病例；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无法为每位新生儿母亲提供3美元的补助，来预防500万婴幼儿的死亡；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可阿玛丽奇仍旧辍学在家，捡拾柴火。如此充满同情的善举，却无法为急需帮助的人们带来这些实惠，这正是悲剧所在。

2005年7月16日，《哈利·波特》儿童系列图书第六卷的首发日，在英国和美国上架的900万本新书，被望眼欲穿的书迷一抢而空，图书零售商们不停地进货，以补充货架。亚马逊和巴诺（Barnes & Noble）网上书店将预定的图书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哈利·波特不需要马歇尔计划，年幼的巫师也不需要国际金融机构。⁴国际社会如此高效地为富人服务，娱乐大众，却不能为濒临死亡的穷孩子们提供12美分的药品，这真令人心碎。

本书写的就是这第二个悲剧。空想家、名人、总统、财政大臣、官僚，甚至军人们都提到上述第一个悲剧，他们的悲悯与努力也值得人们敬佩。然而很少有人提到这第二个悲剧。无数人心怀善意和悲悯去帮助穷人，而我却提出这第二个悲剧，真像一个吝啬鬼。我对许多读者提起过，有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是西方大计划的信徒，相信它能够帮助穷苦大众，而我自己也非常愿意相信它们。时不时地，我会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有罪的无神论者，红衣教主们正开会秘密讨论教皇保罗二世的接班人，而我却闯进去搅了局。虽然帮助穷人的大计划存在许多共识，但读者们仍会接受我对该计划的质疑，正如红衣主教会接受我对新任教皇的提名——流行歌手麦当娜的质疑一样。

然而，我和许多持相似观点的人们仍继续努力，并非放弃对穷人的援助，而是要将援助落到实处。要减轻这一个悲剧，发达国家不得不首先将第二个悲剧列入议事日程。否则，目前这股解决世界贫困的热潮还会重蹈前人的覆辙：从美好憧憬到满心期待，又从沮丧失落到愤世嫉俗。

第二个悲剧源于传统上西方对全球贫困的错误援助方法。本书能够有助于在多年之后，最终发现正确的大计划，对外国援助进行改革，让穷人脱贫、吃饱饭，让孩子们远离死亡吗？过去五十多年中，诸多远比我智慧的人尝试过多种计划，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我已找到可行的计划，那可真是个大突破。

诸位读者尽可放心，本人并未被青史留名的念头冲昏头脑。乌鸦鼓噪般讨论所谓正确的外国援助计划，不过是误人子弟的又一表现。尽管众多前人尝试过，众多今人仍在尝试着发现所谓正确的计划，但是，真正正确的计划，就是不做计划。

计划者的失误，调查者的成功

我们把拥护传统解决之道的人们称为计划者，把寻求别样解决之道的人们称为调查者。为什么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孩子们不能得到价值 12 美分的药品而健康茁壮的富家孩子们能得到《哈利·波特》？其原因就是，12 美分的药品由计划者提供，而《哈利·波特》由调查者提供。

这并不是说生产和分销《哈利·波特》的自由市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穷困潦倒的人们，并没有金钱去刺激市场调查者来满足他们迫切的需求。然而，市场调查者的想法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国际援助方案。

在实施国际援助的过程中，计划者高呼良好意愿，却没有鼓励人们付诸行动；调查者探究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因此获得成功。计划者吊着人们的胃口，却不去满足它；调查者却可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计划者决定供给什么；调查者却在寻找需求。计划者试图与国际接轨；调查者考虑本国国情。高层计划者对基层知之甚少；调查者则去探究基层的现实情况。计划者从不去了解按计划行事是否达到了目的；调查者则去落实顾客们是否满意。如果新的援助仍然无法为孩子们提供 12 美分的疟疾药品，戈登·布朗会为此负责吗？

计划者认为自己已经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贫穷只是一个技术难题，自己的办法足以解决。调查者承认自己事先并不了解问题的答案，认为贫穷

是政治、社会、历史、制度、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调查者希望通过反复证伪试验，找到解决每个具体问题的答案。计划者相信局外人的认识已足以解决问题。调查者坚信只有内部人士的认识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大多数解决方案都由内部产生。

联合国新千年计划主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充满激情且能言善辩。每一次听他演讲，我无不深受感动。可非常遗憾，他那看似聪明的解决方案却不那么让人信服。萨克斯教授提出了一个解除贫困的大计划，共有 449 个援助项目，包括利用豆科植物为土壤固氮以保持养分、实施逆转录酶疗法治疗艾滋病、用特殊编程手机为健康咨询师提供实时数据、建立雨水灌溉系统、建立电池充电站、为身患疟疾的孩子提供 12 美分的药品进行治疗。萨克斯教授在呼吁西方加大援助世界其他地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具体的实施策略，却并非行之有效。根据萨克斯教授的新千年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将牵头这个大计划，并与 6 个联合国官方机构统一行动，与联合国国家小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系列发达国家援助机构相配合。该计划是西方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计划中最新的一个。

谈到那价值 12 美分的药品，计划者们精力有限，却同时还要关注其余 448 个援助项目；他们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不知道每个地方有多少孩子身患疟疾，也不知道在众多医疗诊所中，每一个分别需要多少药品；他们没有工作上心的代理人将那些药品送到那里；当地诊所工作人员薪酬微薄，工作懈怠；众多援助项目代理人既要负责健康体系项目，又要负责疟疾项目；那价值 12 美分的药品，如果出了库房却没有送达患病的孩子手中，没人知道谁该为此负责；当地孩子的家长们，甚至无法与计划者们就药品去向问题进行沟通。

调查者们的工作更有干劲，收效也更好。当他们抱着强烈的愿望去做一件事，同时成本又如此低廉时，他们一定有办法将这件事办成。

2005 年 7 月 16 日，疯狂等待新书上市的书迷们将最新版本的《哈利·波特》一抢而空。因为市场给图书零售商、批发商、出版商们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商人们才有强烈的动机保持图书供应。无数儿童读物作者寻找丰满的人物和曲折动人的意境，以此吸引读者为他们带来收入。曾靠社会抚恤金生活的苏格兰单身母亲 J. K. 罗琳，在创作出小巫师战胜大恶魔的《哈

利·波特》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调查者们发现，如果不是把精力分摊在大计划上，而是集中在一项具体任务上，比如为濒临死亡的孩子们提供药品，收效就会好得多。通过检验调查者们的任务可知，这项具体任务是否对贫苦大众帮助巨大，他们或因援助效果显著而得到嘉奖，也会为任务失败承担责任。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些领域，调查者们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在消除全球贫困这个领域，计划者们控制着外国援助，调查者们鲜有机会一显身手。

计划者们可以做出言词华丽的承诺——终结贫困。唯一与之相悖的是，他们将关于贫困的第二个悲剧，带给了这个世界。忍受贫困的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不仅仅归咎于漠视贫困的人们，同样也归咎于虽然渴望帮助却不懂如何真正给予帮助的人们。尽管我们向计划者们的善意致敬，但为了摆脱贫困，我们必须对他们的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大麻烦和大计划

从购买力的角度看，全球有将近 30 亿人的日消费不足两美元、⁵ 8.4 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⁶ 每年有 1 000 万儿童死于可轻易预防的疾病、⁷ 300 万人死于日益扩散的艾滋病、⁸ 10 亿人喝不上洁净的饮用水、⁹ 20 亿人用不上基本的卫生设施、¹⁰ 10 亿成年人是文盲、不发达国家中有 1/4 的儿童尚未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¹¹ 于是，阿玛丽奇不得不一筐筐地背柴火，无法去学校读书，无法去操场玩耍。

毋庸置疑，贫困问题打动着很多发达国家的人们。为消除贫困，西方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努力。除了来自外国的经济援助，也包括技术支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传播资本主义及民主观念，改善医疗救治条件，以及国家建设、新帝国主义、军事等一系列干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参与到这一努力中。

那么，“西方”到底指的是谁？尽管非西方国家（如日本）和全世界的专家权威们，也参与到使不发达国家转型的进程中，但所谓西方，主要还是指控制着各大国际组织的北美和西欧政体。

穷人们的悲剧激起了进行变革的愿望。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把“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字样挂在世界银行总部大厅的墙上。谈到这样一个梦想时，他激情澎湃地写道：

如果我们能脚踏实地而又充满远见地行动，
如果我们拿出勇气，
如果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分配资源，
我们就会给后代一个更加和平与公平的世界。
只要能减轻一点点的苦难，
全世界的孩子们都会充满希望。
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
这，是我们的责任。¹²

新千年伊始，在纽约，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梦想。它在“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国家首脑聚会”上，承诺将“消除贫困，推动人类尊严与平等，实现和平、民主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¹³

当时，各国政客们尤其对“千年发展目标”表示认可。2015年之前要完成的八个目标包括：一、根除贫困与饥饿；二、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三、推动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地位；四、降低儿童死亡率；五、改善妇女健康；六、防治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七、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八、发展全球合作。这些无一不是美好的目标。

2005年1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瑞士达沃斯（当年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呼吁，通过“大推进”计划，提高外国援助金额，实现非洲的千年发展目标。¹⁴ 布莱尔做了一份“非洲报告”，3月出台的报告，同样呼吁实施“大推进”计划。

2005年7月在苏格兰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将消除非洲贫困的议题列在议事日程首位。2005年7月2日，鲍伯·吉尔道夫（一位为非洲募捐的爱尔兰摇滚歌手）聚集众多知名乐队举办了“现场八方（Live8）”慈善演唱会，试图游说八国集团领导人能够改变非洲的“贫困过去”。在1985年的“巨星资助非洲慈善演唱会”上表演过的埃尔顿·约翰来了，麦当娜也来了，新生代的“酷玩”等乐队也参加了演出。在



八国集团峰会期间，数十万人为了非洲脱贫的事业游行奔走。“现场八方”慈善演出诠释了穷人们的痛苦，音乐会为帮助穷人而进行的努力感人至深。摇滚明星们拿出时间，呼吁全世界人们关心那些在绝望中挣扎、饱受贫困折磨的人们，这真是一件善举。

只有从过去的努力中汲取经验，才能真正在今天帮助穷人。然而，遗憾的是，西方很少能够如期完成上述美好的目标。举例来说，联合国在1990年举行的一次峰会上，提出在2000年前完成对初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已计划到2015年）。早在1977年的一次峰会上，联合国提出在1990年之前，实现全人类使用洁净饮用水及卫生设施的目标（根据千年发展目标，这个期限现在是2015年）。¹⁵然而，从来没有人对这些未完成的目标负过责任。

2005年7月，八国集团达成协议，将援助非洲的金额从每年25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援助额增加一倍。同时，免除非洲在先前尝试“大推进”计划的过程中由援助贷款引发的债务。

目前，这股实施大计划的热潮，正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获得新发展。2003年5月，在打败萨达姆的军队之后，布什总统在海岸卫队军官学院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激励众人：“防治疾病、消除饥饿和贫困等目标，从道德层面展示了美国的影响。威尔逊总统曾说，‘实现人类的解放，美国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神力量’。新世纪里，我们必须把这种力量贡献给全人类的福祉。”¹⁶新军事干涉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干涉大致相同。新帝国主义者与旧时代殖民者的幻想也别无二致。军事干涉与占领体现了典型计划者的思维：通过来自西方的某个简单外部因素，企图改变属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由复杂因素影响着的内部问题。

进行经济援助的“大推进”计划，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外国援助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中央计划和“大推进”规划正风靡一时。这种理念遗留到今天，影响了各机构对经济发展进行计划的手段。世界银行、地区性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国家援助机构都曾受到影响。首先，这些机构呼吁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规划；随后，它们转而呼吁在这些国家开放自由市场。但在很多方面，这些机构本身却继续以计划者的姿态进行运作（直到今天，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在倡导一种类似国家计划的文件，叫做《战略减贫报告》）。

2005年，杰弗里·萨克斯写了一本好书，叫做《贫穷的终结》。在该书中他把全世界的贫困问题看成一个“贫困陷阱”。在这个陷阱中，糟糕的健康、落后的教育、匮乏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大计划中仍有希望。萨克斯写道：“成功走出这个贫困陷阱，远比看上去要简单得多。”

但是，如果富人想帮助穷人，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如果走出贫困陷阱易如反掌，为何计划者们至今尚未做到呢？

使外国援助举步维艰的问题

西方世界如何才能消除其他地区的贫困？设立了像改写贫困历史如此美好的目标后，计划者们试图设计出理想的援助机构，管理计划及财源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过去60年中，虽然有无数针对援助机构的改革方案、种类繁多的计划、2.3万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好的目标仍旧未能实现。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结论：采用大计划，永远实现不了美好的目标。

外国援助到底怎样才能消除贫困？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在苦苦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我最近才意识到，我也深受计划思想的影响，其实应该像调查者那样反过来提出问题。外国援助能为穷人们做什么？

事前设立一个宏大的目标是不理性的。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我们能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运用可行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正如夸口说你养的母牛一定能赢得肯塔基州赛马会一样，设立这样的目标也毫无意义。因为无论通过何种专业训练，都不可能保证你养的母牛获得冠军。还是这样问比较实际：一头母牛能做点什么实事呢？一头母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牛奶、黄油、干酪，还有牛肉（母牛真倒霉）。当然，如果你有一匹颇具冠军相的赛马，没准就能赢得赛马会的冠军，但本书对几十年的援助经历回顾得出的结论是：援助机构是母牛，而不是赛马。

同样，在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援助机构无法消除全球贫困，但它们可以做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去满足穷人们迫切的需求，带给他们新的机会。举



例来说，援助机构可以给埃塞俄比亚的家长们提供现金补助，使孩子们不再被迫辍学，这可比什么“发展”埃塞俄比亚要实用得多。类似的援助项目在其他地方已有开展，它们使像阿玛丽奇这样的孩子们，得以脱离残酷的背柴大军，对未来重新燃起希望。然而，当前仍有很多援助没有用在刀刃上，因为我们仍在不断训练援助机构这只母牛，企图赢得肯塔基州赛马会。

调查者们会寻找一切机会去解除人们的痛苦，比如为学校提供现金补助的项目，而不是陷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在本书中我们将一次次证实以下有关计划者的预测：他们不断将资源用在预先设定好的目标上，而不管许多先前失败的教训，也不顾那些证明该目标并非切实可行的已有记录。我们将看到，计划者们甚至会升级那些先前已失败的干涉计划。他们没有认识到，到底是什么真正帮助了穷人。第二个悲剧继续在上演。目前为止，进行援助的调查者们已经找到了帮助穷人们的方法，如果进行援助的权力天平能够从计划者倾向调查者，我们还将看到后者会发现更多真正帮助穷人的方法。

制定目标也许可以激励斗志，但却不利于实践的开展。自由市场的运行并没有固定的特殊目标，有的只是概括的目标（如商人盈利，消费者得到满足）。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威廉·达根（William Duggan）的著作《成功的艺术》（*The Art of What Works*）是一本好书。在书中他引用达·芬奇的话说，“既然你无法去做你想做的，那么就想着去做（去想）你能做的事吧。”¹⁷达根指出，众多实例告诉我们，事前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埋头苦干，这并不能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其实，成功的商人是调查者，他们不放过任何通过满足消费者来创造利润的机会。他们对实现各个目标的机会进行评估，选择能够在最低成本上实现最高价值的那一个（换言之，即最高性价比）。直到 J. K. 罗琳写出这样一本足以取悦读者的书，图书出版商们才锁定目标，决定去卖这样一本关于年轻巫师的图书。

比尔·达根（Bill Duggan）举了雷·克洛克（Ray Kroc，麦当劳之父。——编者注）的例子：克洛克曾是一名售卖多用混合机（可一次搅拌六个奶昔的机器）的商人。他最初的想法是，尽可能多地把机器卖出去。195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迪诺的一家名叫麦当劳的餐厅中，他发现麦当劳兄弟让八台多用混合机昼夜不停地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这种方法推荐给他所有的客户们，以此增加市场对多用混合机的需求。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因

为他发现，以流水线方式生产汉堡包、炸薯条、奶昔等快餐食品，是经营快餐连锁店的成功之道。于是他放弃了多用混合机的生意，创造了今天无处不在的金色 M 帝国（金色字母 M 是麦当劳的标志）。不停强调计划，让外国援助错过了多少个雷·克洛克啊。

把蚊帐带给穷人

2005 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戈登·布朗、比尔·克林顿、流行歌手博诺等各界名流看好给穷人送蚊帐这个主意，希望它能作为消除贫困的一个主要手段。莎朗·斯通从主要以中产阶级男性为主的观众群中跳出来，当即表示为坦桑尼亚捐助价值 100 万美元的蚊帐。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能够保护睡眠中的人们不被蚊虫叮咬而感染疟疾。它可以有效降低疟疾的感染率及死亡率。若蚊帐能如此有效地帮助穷人，为何计划者们还没有让穷人们得到蚊帐呢？不幸的是，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援助机构的管理者，都不知如何才能将蚊帐送到穷人的手中。这些蚊帐经常流向了黑市，摇身一变成了渔网或婚礼上的面纱，医疗诊所中却毫无存货。

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性组织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简称 PSI），因为工作卓有成效而获得嘉奖，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援助资金。这使它更像一个调查者而不是计划者。从来自官方援助机构的原始资金和后勤支持中，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偶然发现了一个途径，使马拉维的穷人们得以获得那些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国际人口服务组织通过乡村的妇产诊所，以 50 美分的价钱将蚊帐卖给准妈妈们，她们需要这些蚊帐，因为孕妇和五岁以下的孩子是患疟疾的高危人群。护士们每卖出一张蚊帐，可获得 9 美分的提成，这样就可以把蚊帐都留在诊所中，防止流失。同时，国际人口服务组织通过在马拉维的私人部门渠道，以 5 美元一个的价钱，将蚊帐卖给城市中的富有人群。这部分销售的盈利，将用来补助将蚊帐低价卖给诊所导致的亏损，所以该援助项目得以自负盈亏，持续运转。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这种做法，使马拉维全国能够在蚊帐内安睡的五岁以下儿童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8% 上升到 2004 年的 55%。¹⁸ 孕妇得到救助的比例也有了类似的



增长。一项后续调查发现，凡是购买蚊帐的人们，无一例外都在使用它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赞比亚，一个救助项目不管人们想要与否，向人们免费派发蚊帐（计划者惯用的手段）。一项调查显示，在这个项目中，有40%的接受者并未使用得到的蚊帐。现在，“马拉维模式”正向非洲其他国家进行推广。

在华盛顿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总部，并未规定具体的解决方案。是马拉维当地的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分部（其员工大多是长年工作的本地人）在努力改进防治疟疾的办法。他们认为蚊帐会起到作用，于是联系了妇产诊所，并应用了这个双渠道的销售模式。这种办法并不是进行援助的万能药，它只是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社会变革的哲学

在西方学术史上，长期以来有关社会变革的哲学争议的最新表现，便是计划者与调查者在西方援助问题上的纷争。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巧妙地将其描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民主改革”。¹⁹ 这种划分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9世纪后期描述的“革命”与“改革”十分接近。从那时起，社会工程试验就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背景之下，比如将坦桑尼亚人安置于国有村落中，以及在苏联及东欧发展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讽刺的是，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采用“休克疗法”而抛弃了“渐进式疗法”的社会工程又一次被证明是肤浅之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工程出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名为“结构性调整”的全方位改革。当代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极致，是武装干涉推翻邪恶的独裁者，再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模式构建社会体系。要终结全球贫困的计划处处彰显着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自命不凡。

民主政治应该一步步地找寻解决方案：某个当地组织通过政治活动，为公共服务事业（如垃圾回收）造势，某位政客意识到这是赚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于是帮助这个组织满足其需求，并赢得该组织的信任和支持。